

跨世纪的中国修辞学

李名方 主 编

河海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跨世纪的中国修辞学/李名方主编. —南京: 河海大学出版社, 1999. 4

ISBN 7-5630-1373-3

I . 跨... II . 李... III . 汉语-修辞-文集
IV . H1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14031 号

河海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南京西康路 1 号 邮编: 210098)

扬中市印刷厂印刷

江苏省新华书店经销

1999 年 4 月第 1 版

199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13.875

字数: 373 千字

印数: 1 ~ 1000 册

定价: 24.00 元

修辞研究中的科学精神和人文主义

(代序言)

王希杰

一 科学研究就是不断地科学化的过程

80年代以来,中国修辞学在呼唤着科学主义。

呼唤科学主义,是人类进步的表现,是历史发展的大趋向。当然,在今天,这有时候也是一种时代的时髦。在中国修辞学中,呼唤科学主义,提倡现代化,也同样是一个历史的大趋势。我们认为,中国修辞学的发展方向就是:从无科学、不科学到科学,再从不怎么科学到很科学、十分科学、更高层次上的科学的一个不断向前迈进的运动过程。

科学是一个历史的概念。不同时代的科学有不同的含义。科学的标准是在不断地发展和变化的。一切学术研究其实就是不断地追求科学化的过程,而且这个过程是永远也不会完结的。因此,我们不能用后代的科学标准来否定前代人的学术研究,一概简单地斥责为不科学、反科学,甚至是伪科学;同样也不能顽固坚持着前代人关于科学的概念和标准,来束缚后代人的手脚,反对后代人的大胆创新。在尊重前人创造的基础上,大胆创新,这是每一代学者的历史使命。

就对待传统的态度而言,中国语法学和修辞学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语法学中,每一次创新,每一个里程碑,都光荣不了多少时候,很快就遭受到了批评和评判,甚至是攻击。马建忠和他的

《马氏文通》,黎锦熙和他的《新著国语文法》,等等,正是因为他们的成就特别大,贡献特别多,所以才受到比别的人和别的著作更大的冲击和否定。从这个意义上说,被攻击和否定正是他们的光荣。也正是具备了这样一种敢于向权威挑战,敢于否定已经取得的成就的精神,中国的语法学才成了中国语言学发展的火车头。当然,有时候、有些地方,也出现了否定过火的现象。但是,那毕竟是第二位的。中国语法学的发展道路就这一点来说是成功的、对头的,可以作为语言学中其他学科的榜样。

比较起来,在修辞学中,似乎是过多地强调继承而忽视了否定,或者说大大缺少了语法学中的那种大胆自我否定的精神——对于传统和自己所获得的成功之否定。我们都承认陈望道和他的《修辞学发凡》的历史功绩,这是谁也否定不了的。但是,陈望道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就在于他大胆创新。在纪念陈望道诞辰一百周年的会议上,我在发言中强调说:“陈望道是一个伟大的开拓者,我们纪念他,主要任务并不是重复他的结论和例句,而是学习他的创新精神,在我们自己的修辞研究中发扬不断创新的精神。这才是对陈望道的最好的纪念。”然而,一直到1996年,在修辞学杂志上还出现这样的说法:现在看来,陈望道的《修辞学发凡》还是一个字也不能改动的!修辞学界以外的人,例如有些语法学家,一再指责修辞学还是陈望道那一套,不过是对《修辞学发凡》的修修补补而已。这有他们误解的一面,他们没有认真阅读和研究修辞学的论著,对修辞学的现状不太了解;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修辞学界相对于语法学界来说似乎少了一点自我否定、批评和批判的、不断发展的观念和行动。

与修辞学形成强烈对照的是,在语法学中,伟大的马建忠是后来学者的靶子,经常处在被批评和批判的地位上;而在修辞学中,伟大的陈望道是后来学者无限崇拜的偶像,一味引用的对象。这是陈望道的幸运,也是他的不幸。说是幸运,因为他永远是正确

的,永远是不可替代的;说是不幸,因为这样一来,他也太寂寞了。1995年10月在黄山语法修辞研讨会上,南方一位教授说:“修辞学要破除对《修辞学发凡》的神话。”当场,大家都说:这话只能在这里讲讲,不能外传。我当时想,如果这话是错误的,那么在黄山也不应当讲;如果是有道理的,对中国修辞学的发展有好处,那么就不应当只是在黄山讲,还应该公开地当众来讲。我又想:为什么这话只好在一个小范围里讲讲呢?为什么就不可以在一个大的范围里来讲呢?这大概是同修辞学界对“科学”的看法不太准确有关系吧?似乎如果是科学,那么就应当永远是科学,永远不能被替代。其实,科学的东西是要、也是必然会被更加科学的东西所替代的。牛顿定律被更科学的东西所替代,这并不是否认牛顿的学说是科学的,更不能因此而抹煞他在科学发展史上的崇高地位。

先举一个例子来说吧,在陈望道的《修辞学发凡》的第一篇“引言”第七节“修辞学的功用”中,陈望道对于修辞学的功用说了三点:(一)确定意义,(二)解决疑难,(三)消灭歧视。^①现在看来的确是狭隘了一些。其实,修辞学的最重要的最基本的功用应当是沟通人际关系,和谐人际关系,是一个社会稳定、团结、和睦的手段,是个人社会化的手段,是实现“理解万岁”的重要途径,是美化社会环境、提高民族文化素质的工具。

再如,陈望道在《修辞学发凡》中说:“一切健全的写说都是内容决定形式的,而内容又常为立场、世界观和社会实践所决定。没有正确的政治立场,没有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没有革命的社会实践,便不会有健全的内容,也就不会有健全的形式。修辞学的本身,也是如此。”^②这一观点,现在看来,是很不对头的,其不对头之处,也是十分明显的,是决不能够作为我们今天修辞学研究的一个出发点的。

① ② 陈望道《修辞学发凡》,17-18页、19页,上海教育出版社,1976。

所以,当 21 世纪在向我们招手的时候,当我们在思考如何跨入 21 世纪的时候,我认为,我们首先应当承认和坚持一点:“科学研究就是不断地科学化的过程。”从这个原则出发,在继承的前提下,我们就可以大大方方地同修辞学传统进行平等而友好的对话,必要的时候也可以批评和批判我们的修辞学传统。我们大家都要认识到,在修辞学的发展过程中,如果陈望道和他所代表的修辞学传统中的某些结论被后来人所推翻了,这不是陈望道他们的羞耻,而是他们的光荣,他们的学说发展了,前进了;也并不是后来人对前人的亵渎和背叛,而是他们真正地继承了前人所开创的事业。也许,只有具备了这样的精神,中国修辞学的 21 世纪才是辉煌的。这也正是科学精神的一个组成部分。

在我们作跨世纪的思考的时候,对于科学精神,我们认为最重要的是两条:第一,自我批判和自我否定的精神;第二,对最简化原则的追求精神。

既然科学本身是属于历史范畴的,那么科学就不能停止不前,僵化保守就是科学的大敌。科学传统都具有两面性,一方面保证科学沿着健康的道路前进,另一方面它又是科学继续前进的障碍和阻力,换一句话说,科学传统都有保守性,而保守性正是科学发展的敌人。科学精神的核心就是不断革命,所以科学传统就也成了科学发展的敌人。因此,科学精神的核心也就在于不断地自我否定和自我批判。这又有两层含义,一是针对传统的,二是针对研究者本身的。中国修辞学家,一方面要对中国传统修辞学包括陈望道和他的《修辞学发凡》在内的现代修辞学的遗产保持一定的批判能力,另一方面对自己的研究成果也同样要保持一定的批判能力,要清楚地认识到我们自己也只是修辞学发展流中的一个小小的“点”——承前启后的一个“点”而已。

在科学化的问题中,当前最值得我们重视的问题是“科学化和最单性原则”。在我们看来,科学的最大的标志就是它的最简单

性。这有三个方面的理由，第一，科学理论本来就是人们认识和把握客观世界的一个大大简化了的模式。第二，宇宙之中最基本的法则也正是最简单性，宇宙本身就是按照最简单性原则构造出来的，那么作为宇宙间客观存在的规律性的一种反映，必然也应当是最简单性的。第三，中国文化的传统就是最推崇最简单性原则的。《周易·系辞上》中说：“乾以易知，坤以简能。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易知则有亲，易从则有功。有亲则可久，有功则可大。可久则贤人之德，可大则贤人之业。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周易》本身给我们做出了最简单性原则的榜样：乾坤二卦对立、互补、互转，派生演化而为四、八、十六、三十二、六十四卦。天下万物就全部都包容在其中了。“乾为天，为圆，为君，为父，为玉，为寒，为冰，为大赤，为良马，为老马，为脊马，为驳马，为木果。坤为地，为母，为布，为釜，为吝啬，为均，为子母牛，为大与，为文，为众，为柄，其于地也为黑。”简单而有用，就因为它是开放性的、兼容性的，简单之中就包含着复杂性的一面。

繁琐哲学，一不符合宇宙的本来面目，二不便于人们认识和把握客观世界的活动，因此是不科学的，不可取的。繁琐哲学是我们没有把握住事物的本质的一种表现。一旦把握了事物的本质特点，就会摒弃繁琐哲学。例如，在我们没有找到女人和男人之间的真正的区别之所在的时候，就可能列举出许许多多的区别来，繁琐之极，很不好把握。但是，找到了男女之间的真正的区别，即染色体的不同，就非常之简单，也是最科学的。在修辞学研究中，我们要避免用繁多的条例来炫耀自己的高明，其实繁多只能表明我们还没有发现和抓住修辞现象的本质特征，只能说明我们缺乏抽象概括的能力，是不值得炫耀的。这在修辞格的研究方面表现得特别明显。

二 人文精神和传统文化的复兴

中国现代语法学和修辞学的发展道路有同有异。同者在于两者都是在外国语言学的刺激和促进之下成长起来的。不同的是，第一，两者对外来文化的借鉴程度有别，从一开始在这方面就显示出完全不同的道路。语法学主要是大量地引进了西方的学说，离开西方的语法学说几乎就没有中国现代语法学。而修辞学则开始就在自己民族的修辞学传统之上适当地有选择地接受外国的修辞学说。这是因为在中国传统语文学中没有什么语法学的内容，而修辞学的传统却是非常悠久而丰富的，在世界修辞学的总体中，中国修辞学是有自己的独特的风格和传统的。可以说，一百年来，中国的语法学基本是在跟着外国走，而中国的修辞学则一直基本上走着一条相对独立于西方的道路。

于是，如何摆脱西方语法学说的束缚而使中国语法学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就是摆在中国语法学家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中国语法学家逐步认识到了这一点，他们努力挖掘汉语语法的民族特点，把建设符合汉语特点的语法学说当作自己最重要的任务。他们所选择的这条道路是十分艰辛的。换句话说，就是西方语法学说的中国本土化的道路是十分艰苦而漫长的。相对而言，这个问题在修辞学中就几乎不存在，或者说问题并不很大。如果说，中国语法学家总是感觉到自己与西方同行之间有那么一些差距，总有心理不平衡感，那么在中国修辞学家中，这样的差距感就相对要小得多，似乎在修辞学方面西方同行也并没有多少东西是中国修辞学家必须急不可待地去引进的，虽然在一些修辞学家中也存在着中外的差距感。

但是，如何继承和发扬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摆脱西方文化某些不利的影 响，同样也是中国修辞学界面临的问题，需要尽快解

决。

在这里就讨论一个修辞效果的问题。修辞效果的最重要的决定因素是语言文字本身,还是在语言文字之外说写者的人格呢?宋朝大学者陈亮在给朱熹的信中说:“夫说话之重轻,亦系其人。以秘书重德,为一世所尊仰,一言之出,人谁敢非?以亮之不肖,虽孔子亲授以其说,才过亮口则弱者疑之,强者斥之矣。”^①显然,在陈亮看来,归根到底,交际效果还是取决于说写者的人格力量,或者说说写者的人格力量比语言文字本身更加重要。在中国传统修辞学中,总是把话语同说写者紧密联系,这其实是抓住了修辞的关键。而在西方学术传统中,则更加注意和重视语言文字本身的力量。东方修辞学、中国传统修辞学把精力更多地集中在说写者的精神世界的修炼上,而西方修辞学则把注意力和力气主要花在语言文字的修饰上。

朱熹在答陈亮的信中说:“细读来喻,愈觉费力,正如孙子荆‘洗耳’‘砺齿’之云非不雄辩敏捷,然‘枕流漱石’终是不可行也。”《世说新语·排调》中记载说:“孙子荆年少时欲隐,语王武子‘当枕石漱流’,误曰‘漱石枕流’。王曰:‘流可枕,石可漱乎?’孙曰:‘所以枕流,欲洗其耳;所以漱石,欲砺其齿。’”从朱熹对孙子荆的批评和否定中,我们可以看到他把说写者的诚恳诚实的态度放置在语言文字本身的推敲之上。他承认孙的雄辩和敏捷,但是还是否定了孙。

这可以说是中国修辞学的传统,优秀的传统。从老子和孔子开始,就反对过分追求华丽的表达。这一点已经深入普通老百姓的心中。我们常说“花言巧语”,“花言”是花儿一样的话语,巧语是巧妙的话语,本来应当是好东西,但却是指恭维话,欺骗人的话语,是应当否定的。这就是说,离开了说写者的人格,缺乏了诚意,失

① 《己巳春书之一》,见《陈亮集》287、309页,中华书局,1974。

去了真实性,只是追求语言文字本身的美丽和奇巧,这种做法并不是修辞的正路,是应当、必须否定的。

美国语言学家戴尔·海姆斯指责现代语言学说:“语言学的主要特点之一是把结构作为理论研究的首要目标而贬低语言的运用,同时又不放弃语言具有重大意义的观点(与此相反,古典的研究方法则是把结构当做运用的手段,语法学家服从于修辞学家)。这样产生的结果有时会很幸运的:一方面,把目标限于独立、随手可得的结构方面的材料,能保持先进科学的声誉;另一方面,尽管忽视了语言运用的社会因素,也能保持研究人生根本问题的名声。”^①在西方的修辞学中,则表现为,把目标限于独立、随手可得修辞现象的形式方面和结构方面的材料,把目的局限于构建修辞形式和修辞结构方面的系统的框架模式,来保持先进的科学声誉——来标榜自己的科学性。

中国现代修辞学在向西方修辞学学习方面是比较有成果的,引进了许多新的有用的术语和概念,建立起了形式和结构的大框架,的确是朝着可行化的大道大大地迈进了一步,然而同时也就在一定程度上丢弃了中国传统修辞学的灵魂——“修辞立其诚”。这其实是得不偿失的。

如果我们再一次比较语法学和修辞学的话,那么,它们之间还有一点差别也是十分值得我们重视的。那就是:作为对于语言内部的微观结构的描写和分析,语法学在一定程度上完全可以摆脱社会文化而对语言的语法现象作一种封闭的考查、分析和研究,在此基础上建立某一种语言的语法系统。当然,语法研究也需要在某种程度上适当联系语言之外的社会文化环境因素。同语法成鲜明对比的是:在修辞学的研究中,研究者不能离开社会文化条

^① 戴尔·海姆斯《论交际能力》,见祝畹瑾编《社会语言学译文集》5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

件。这是因为,从本质上看,修辞本来就是一个社会文化心理问题,交际行为本身是一个社会文化心理过程,交际效果的最重要的决定因素显然是双重文化心理因素。离开了社会文化心理,就没有修辞学可谈了。

在做语法练习的时候,在评论语法错误的时候,我们完全可以不理睬社会和文化背景,完全可以脱离交际活动的具体环境。但是,在做修辞练习和评论修辞的得失的时候,就一刻一点也不能离开社会和文化背景,完全不能脱离交际活动的具体环境。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现在的辩论比赛,其实就已经偏离了辩论的真谛,走上了歧途。辩论的真谛应当是自觉地为维护真理而斗争,为真理而献身——包括自我“牺牲”(指的是荣誉、面子等)。辩论的正确态度应当是:第一,我所维护的、为之辩护的应当是我所相信的真理,我是在为真理而斗争;第二,我谦虚谨慎,虚心向对方学习,勇于修正我的错误,决不固执己见。因此,在真正的辩论中,敢于承认自己的错误,敢于向掌握了真理的辩论对方“投降”,是伟大的辩论家,是应当赞美的。他没有失败,他同样是胜利者——向真理投降的人是不能叫做“失败者”的。然而,我们今天的辩论比赛,却经常去为自己明明知道是错误的、自己所反对的观点来辩护,把攻击对方打败对手当做唯一的目标,这就把辩论引向了歧途。培养为自身所反对的观点辩护的人,这与社会进步和繁荣的目的是一致的,但与中国修辞学的传统很不一致,显然是向西方学习的结果。在这方面,我们特别要重视《周易》。“修辞”两个字最早就出现在《周易》之中。《周易·上经》一开始就把中国修辞学定位在“诚”字上。“子曰:‘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朱熹注说:“忠信,主于心者,无一念之不诚也。修辞见于事者,无一言之不实也。”《周易·系辞上》载:“子曰:‘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朱熹注说:“断金、如兰,言物莫

能间,而其言有味也。”^①“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后动,易其心而后语,定其交而后求。君子修此三者,故全也。’”周敦颐说:“诚,五常之本,百行之源。”^②

正是因为从“诚”字出发,中国传统修辞学就把慎言和得体当作修辞的最重要的原则。《周易·系辞上》中说:“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则千里之外应之,况其迩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则千里之外违之,况其迩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发乎迩,见乎远。言行,君子之枢机。枢机之发,荣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动天地也,可不慎乎?’”“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处,或默或语。’”

沉默是金。不当言则不言,这也是中国传统修辞学中的一大重要原则。《论语·卫灵公》中记载:“子曰:‘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知(通智)者不失人,亦不失言。’”《论语·季氏》中又载:“孔子曰:‘侍于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谓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谓之隐;未见颜色而言,谓之瞽。’”《孟子·尽心上》中说:“孟子曰:‘挟贵而问,挟贤而问,挟长而问,挟有勋劳而问,挟故而问,皆所不答也。’”朱熹注曰:“尹氏曰:‘有所挟,则受道之心不专,所以不答也。’此言君子虽诲人不倦,又恶夫意之不诚者。”中国修辞学并不一味地教人说话,还教导你不该说的时候和地方就不要说,不说也是修辞,这就看得体与否了,这就是得体性原则。

中国传统修辞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对中国修辞学作跨世纪的思考,就应当把修辞学放置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大背景之中来考察,把中国修辞学的现代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联系起来思考。

① 朱熹注《周易》,27页、14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② 《周敦颐集·通书·诚下》。

三 修辞学的两大部门

中国现代修辞学中有两大分野之说,就是把修辞学区分为消极修辞和积极修辞。这一区分是有好处的,不仅反映了修辞现象的明显的区别,也比较容易把握,特别是在实用修辞读本编写方面的确有方便之处。因此我们相信,这一区分还会被许多修辞学家所采用。我们不必推翻它,取消它,它对修辞研究、教学和普及都是有好处的。

但是,我们也认为它并不是唯一的区分法,甚至也不一定就是最好的区分法。我们现在在这里提出一种两分法:从哲学上的一对范畴“形式”和“内容”出发,在修辞学中,区分出修辞形式学和修辞内容学两大部门。造物难,造名亦难,有时候造名比造物还要难。现在我们还没有想出比较合适的名称呢,“修辞形式学”?——“形式修辞学”?——“微观修辞学”?——“静态修辞学”?和“修辞内容学”?——“内容修辞学”?——“宏观修辞学”?——“动态修辞学”?哪一个更好一些呢?很难说。重要的是,这一区分不但比较符合于修辞现象的本来面目,也有利于纠正修辞研究中的某些偏差。

说是“修辞形式学”或者“形式修辞学”,因为它是单纯从形式方面来涉及修辞现象的,不顾及话语所表达的内容。说是“微观修辞学”或者“静态修辞学”,因为它只是局限于语言文字和话语本身来考查修辞现象的;如果用我们在《修辞学通论》中所说的四个世界的观念来看待问题,那么它只是就语言世界研究修辞现象。我们知道,交际场是由说写者和听读者通过话语为中介而组成的,交际效果并不只是由语言文字话语所决定,而是受到多种变量的制约和控制的。这些多种因素是可以变动的。因为修辞形式学不考虑这些因素,所以只是静态修辞学或者微观修辞学。修辞形式学

(微观修辞学)是从形式和手段方面来对修辞现象所作的一种研究,它所关心的只是与表达效果有关的语言文字的形式和手段,是较低层次上运用语言文字的规则。中国古代的沈约等所主张的四声八病说,就是最典型的形式修辞学规则。各种修辞格就是微观修辞学中重要的内容。现代修辞学所热衷的提供许多可以运用的修辞手法、规则的修辞学,当然是绝对没有阶级性的,甚至也没有思想性——它所追求的是绝对纯客观的东西,不带任何主观色彩,什么人都可以利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在这个层次上,孤立地看,它的规律规则都是同时为好人和坏人服务的,一切骗子手都可以利用它来为欺骗人伤害人服务。即使研究者主观上并不想为骗子手服务,可是他也没办法不让骗子手来利用它去欺骗人伤害人。如果修辞学只是修辞形式学,修辞形式学就是全部的修辞学的话,那么修辞就不可能真正与骗子手划清界限。

说是“修辞内容学”或者“内容修辞学”、“宏观修辞学”或者“动态修辞学”,是因为它更重视交际活动中话语的内容和非语言文字因素对交际效果的影响和制约作用。它认为,语言文字和话语本身不但不是影响、制约、决定交际效果的唯一因素,甚至也不是最重要的因素——起码在许多时候是如此,而只是在较低的层次上影响、制约、决定着交际的效果,其发生作用还必须满足其他条件。语言文字的交际作用很容易被其他因素所改造。完全相同的话语出自不同的人之口,含义和效果就会完全不同。“您真好,我非常尊敬您。我要向您学习。您永远是最最尊重我的人。”然而,因为你是一个专门说谎的人,听话的人是根本不相信你的,尤其是如果你曾经欺骗过他的话。“你这个人真太可怕了!你太坏了,你最坏了!我好怕你呀!”可是,那语气,那眼神,却表达了相反的意思。宏观修辞学已经超出了语言、文字和话语的范围,把修辞研究扩大到语言世界同物理世界、文化世界和心理世界之间的相互关系上来了,它研究交际活动中影响、制约、决定交际效果的多种因素的

复杂的相互制约关系——动态的关系。

宏观修辞学认为,形式只是形式,手段只是手段,这并不是修辞中最重要的。修辞中的核心问题是:“言”和“意”、“言”和“行”、“言”和“德”的问题。如果说微观修辞学把注意力全部放置于语言文字本身,那么在宏观修辞学中,语言文字只是达意的一种手段,并不是交际的目的之所在。儒家主张:“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周易·系卦上》)“孟子曰:‘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孟子·尽心下》)“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孟子·万章上》)庄周则主张得意忘言,他寻求的是忘言之人。“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庄子·外物》)明代学者杨慎在《洞天玄记》中写道:“迷方者执文以泥象,知音者得意忘言。”关于言和行,“子曰:‘君子耻其言之过其行。’”关于言和德,“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论语·宪问》)后一句是对的,前一句并不准确。

宏观修辞学和微观修辞学是大修辞学中相互联系而又相互区别的两个部门。修辞学必须理顺两者之间的关系,只有做到这一点,修辞学才是科学的,对人们的实际交际活动才具有指导作用。这个关系就是:微观修辞学是最重要的基础,而宏观修辞学是控制微观修辞学规律规则的必要因素。或者说,微观修辞学提供表达手段和材料,而宏观修辞学提供运用这些手段和材料的原则。对整个修辞学而言,宏观修辞学是它的灵魂。而这个灵魂中的灵魂则是一个“诚”字。这个“诚”字,是“和合”文化的重要内容。具体一点说,也就是合作精神和礼貌态度,其表现形态就是得体性原则。这正是中国传统修辞学的精华和灵魂。这个传统主要是儒家所发挥和光大的。当然,如果失去了微观修辞学这个基础,宏观修辞学就落了空,成了“空头修辞学”,也是没有什么用处的东西了。微观修辞学必须在宏观修辞学(修辞内容学)的制约和指导之下运

转。如果没有宏观修辞学的控制和制约,微观修辞学的规律、规则、技巧就可能堕落为骗子手的帮凶,而最终失去了自己存在的价值和繁荣的社会基础。

如果把东西方的修辞学作一些对比的话,也许可以说,西方的传统比较重视修辞形式学(微观修辞学),而中国的传统则更加重视修辞内容学(宏观修辞学)。或者更合乎事实的说法是,东方的、中国的传统修辞学是重视宏观修辞学而且微观和宏观并重、两者相对结合得比较好的修辞学。中国现代修辞学在向西方学习中进一步发展了微观修辞学,同时却走向一个失去了控制的微观修辞学。这就是我们近年来说中国现代修辞学在前进的道路上牺牲过多的原因。

近年来,中国语言学界大谈语言学是一门领先的学科,这以伍铁平为代表。修辞学界也有人在大谈修辞学应当是一门显学,这可以以宗廷虎为代表。我们当然希望、欢迎中国修辞学能够成为领先的学科或者显学。但是,这并不以我们个人的意志为转移。在我们看来,只有能够向其他学科提供方法论原则的才有可能成为领先的学科或者显学。我想,如果修辞学只是局限在微观范围之内,只是就一些修辞格罗列一些语言事实,更不用说是去抄袭一些例子了,这就根本谈不上成为领先学科或者显学了——而只能是一门相对落后的学科。现在区分了微观修辞学和宏观修辞学,理顺两者的关系之后,修辞学就再也不能够关起门来孤立地进行研究了,必须同相关学科一同“攻关”,联合“作战”,修辞学必须解决许多其他学科也同样关心的问题。这一来,修辞学在整个科学体系中的地位就必然重要起来,其他学科也不能忽视修辞学的存在和研究成果了。

这个问题,其实并不是今天才出现和存在的,而是早就摆在我们面前,不过我们没有重视它罢了。甚至其他学科提了出来,我们还没有响应,虽然这本来是我们修辞学中的重大课题。例如,修辞

学和历史学都关心都感兴趣的课题是历史修辞学。李红岩在《史学本文与历史认识》一文的提要中说：“也许，在一些史学家看来，史学本文问题，只是史学中的细枝末节，即使要研究，也是语言学家或修辞学家的事情。其实，史学本文问题，实质就是一个历史认识问题。思想方法与写作方法，总是内在地统一在一起的。以修辞来说：史由书载，书由人成；史家操笔，或轻或重，词气之间，走漏已甚。故史书中一字而运用不当，或可致史实失真；一字运用得当，或可使史实真相毕现。而文字之当与不当，关乎修辞之妥与不妥；修辞之妥与不妥，又关乎史实之真与不真。然则，史书修辞，其可轻视耶？谓其与修辞无关，得乎？”“史学本文总是一个完整的书面语言系统，它所采用的修辞方式，所形成的修辞风格，不仅反映着书写者的撰著风格，而且反映着它的史学观。”^① 他所提出来讨论的问题其实是修辞学和历史学所共同关心的，是双方都必须解决的问题。然而我们修辞学家总是把自己关在文学作品的牢笼之中，只关心美文的修辞。

李红岩在他的提要中又说：“从修辞角度看，中国传统史学可分为两派，我无以名之，姑名之曰：科学派和艺术派。科学派‘尚质’，艺术派‘尚文’。唯其尚质，故认史学为科学；唯其尚文，故认史学为艺术。……科学派所守者，史家之文也；艺术派所守者，文士之史也。文士重‘文’，史家重‘笔’。科学派为修辞之实用派，艺术派为修辞之文艺派。”^② 如果我们区分修辞学为微观和宏观两个部分，那么也就可以说，史学中的艺术派是把微观修辞的原则放在首位的，而科学派则强调了宏观修辞学原则的第一性位置。

过去的修辞学把名家名篇的修辞技巧当做普遍的规律，一切修辞的楷模和规范。这当然是一个误会。交际活动本来是与千百万使用语言的人密切相关的，但是现在大多数人对修辞毫无兴趣，

① ② 《学人》第八辑，311～312页，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